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臺灣人類學刊 22（2）：19–24，2024

推動臺灣人類學「起家」的應時之師：
人類學家、田野、影像

導言

劉斐玟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本專號的籌辦，是為了向早期推動臺灣人類學「起家」的先行者致敬！

凌純聲（1900-1978），臺灣人類學建制化的重要推手：一位有器識、有擔當，而又心胸開闊的學者；一位值得後人效行、卻被輕忽半世紀之久的學術典範。他是諸多學術議題的探路先鋒：既首開田野調查與史料分析的相互為用，亦探索民族學、史學、考古學和民俗學等多元學科的合流，乃至從中國、臺灣、東南亞到環太平洋地區的文化比較研究。在大陸，他揭開中國科學民族誌的序幕；在臺灣，則以胸懷世界民族誌的跨時空視野，促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成立。

1955 年，民族所籌備處成立。當時有諸多問題待解：人才不足、經費不足、沒有辦公大樓等；這些，都靠凌純聲堅忍的毅力和運籌帷幄，一一克服。他不但不拘一格的多方延攬人才，還透過集體田野的方式訓練新人；甚且，自籌備處成立翌年起，即按期出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以帶動民族所的研究風氣；更重要的是，他釐定民族所的發展方針，將民族所的研究重心，逐步由臺灣原住民文化拓及臺灣漢人社會。即便經費極其拮据，他依然堅持文物採集的重要性，並設立文物典藏機制（例如：田野所採集的任何物件、拍攝的影像，甚至田野筆記，都不可放入個人口袋），乃至民族所有了辦公大樓後（1963），隨即闢建「標本陳列室」（即今之博物館）。民族所今日得以和原住民團體進行「共作展」，實得力於凌純聲一甲子前多方採集原住民文物的高瞻遠矚。凌純聲一步步啟動臺灣人類學的建制化工程。

開創者奠定根基，也需後人持續耕耘，進而開疆拓土。接手凌純聲職掌中研院民族所的李亦園（1931-2017），成就的正是臺灣人類學的「開枝散葉」，乃至「一花開五葉」。一者，將臺灣早期人類學由記錄原住民傳統，擴及到對文化變遷的探索。方其時，來臺從事田野的海外人類學者還著眼於臺灣的「傳統性」之際，李亦園在宜蘭南澳泰雅族的考察中，已然意識到：若要了解文化全貌，「固有」與「變遷」應是齊下的雙管。

李亦園開演臺灣人類學的第二個面向，是將理論觀照導入早期以描述和記錄為主的田野考察與民族誌書寫中；所謂「理論觀照」不只是援引西方理論（如：功能論、文化與人格學派），更在於以臺灣原住民的田野材料來建構理論。李亦園於1962年撰就的〈臺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宗教結構系統〉，就揭櫫了「結構系統」的理論概念。二十年後，黃應貴（1984）根據李亦園的「結構系統」，輔以Marshall Sahlins（1963）的「首長」及「大人物」概念，對臺灣原住民進行分類。值得一提的是，李亦園的「結構系統」比Sahlins的論著還早一年發表。

其三，建構臺灣人類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跨學科論述場域；李亦園和楊國樞主編的《中國人的性格：科際整合性的討論》（1972），堪稱箇中代表。其四，以學者身份向政府進言，倡議將宗教納入學術研究的範疇，乃至促成原住民委員會的成立。其五，走出學術象牙塔，面向社會大眾，以演講和隨筆等方式，引介人類學；莊英章、徐正光、瞿海源等都是在其影響下，踏入人類學和宗教的研究領域。李亦園堪稱是臺灣公共人類學的領航員。

先行者，或因個人識見而締造風雲，或是集眾人之力而建功立業。中研院民族所早期的原住民田野考察，就是以集體方式共作。集體田野的策略考量有二：一是加快記錄傳統文化的腳步，以搶救即將消失的原住民文化；二是為新起步的臺灣人類學培養人才。南澳泰雅人的研究計畫，就是在凌純聲策劃下，由李亦園主持，偕同新進同仁石磊，帶領當時在台大就讀人類學的徐人仁、宋龍生、楊福發、阮昌銳、吳燕和等，進行田野考察、文物採集，並拍攝田野照片。這些田野照片不僅是原住民文化的影像紀錄，更是歷史見証——見証了田野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原住民朋友們，如何為保存文化傳統而協力共作。

集體之力的另一種呈現，是1950～1980年間來台進行漢人社會研究的海外人類學家，包括Myron Cohen、Burton Pasternak、Stephan Feuchtwang、Hill Gates、Emily Martin、Stevan Harrell、David Schak等。這些學者因無法前進

大陸進行中國研究，退而求其次，改以Maurice Freedman（1969）所謂的「剩餘中國（residual China）」作為替代田野，臺灣因之成了「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陳紹馨 1966）。雖說他們是項莊舞劍，本意不在「臺灣」，而是「透過臺灣」看中國（Hong and Murray 2005），但他們畢竟是以臺灣農村為田野所在地，記錄的也是臺灣當時的社會文化，因緣際會成了「臺灣研究」的先行者。他們對「中國何以中國」的兩大問題意識：宗族體制和區域連結性，促發臺灣人類學界開始研究漢人社會，從而發展出臺灣漢人移民社會的兩大理論概念：土著化和祭祀圈。

本專號就是以上述四類先行者為軸線，交織出臺灣早期人類學的發展圖像：臺灣人類學建制化的先行者凌純聲；臺灣人類學開枝散葉的先行者李亦園；臺灣人類學民族誌的先行者，即人類學田野考察團隊和他們的原住民朋友們，而這一群先行者的具象化就是當年所拍攝田野照片。最後，則是臺灣漢人社會和臺灣研究的先行者，來自海外的人類學者。而撰文陳述這四類先行者的作者——何翠萍、劉斐玟、林文玲、謝力登——也各自以其「文化史觀」，或橫看，或側觀，乃至回望等方式，共同描繪出這段學術發展進程。

何翠萍即是以凌純聲其人、其事及其懷，來陳述凌純聲的民族學理念和人類學行止。一般在談論學者的學術貢獻時，多以學術論學術，但何翠萍卻勾勒出一個兼顧「學術」與「情感」的人物圖譜：她不僅將凌純聲所處的時代脈動、學術思潮及個人生命經歷（家庭、求學、工作），進行交互論述；更重要的是，她將生命經歷所涵化的性格和稟性，也一併納入考量。有鑑於此，何翠萍在資料的取用上，除學術論著外，更廣泛援引公文檔案、年譜、私人書信和口述訪談（家人和學生輩）。而這，正是何翠萍所揭櫫的人類學史觀。在這些多元資料的交互論述中，我們看到一位個性內斂、堅毅、勤奮，卻又熱情的學者。這些性格特質讓我們在理解凌純聲學術生涯中的一些關鍵抉擇時，多了一層觸動。凌純聲在民族所成立過程中，所展現的「有守」、「有為」，即最佳例證。

早在大陸時期，當局就有設立邊疆文化研究所和新疆研究室之議，而凌純聲都是屬意的主持人選。但這些議案最終以學術政治化為由而遭擱置。面對這些議案，乃至「中華民族是一個抑或多元」的議題上，凌純聲都未發一言，而這，和他內斂少言的性格有關。直到1943年，當中研院組織法修訂並明定增設新所，而民族所名列其中，凌純聲才一改沉默，以紹還蔡元培遺志和民族學在當前局勢的重要性為由，積極向上陳情。從中，可見凌純聲對民族學的熱情和抱負。

不過當時在科學主義掛帥下，上級似乎更屬意成立體質人類學，而非民族學。

大陸時期，中研院未讓民族學獨立設所，何以到了臺灣，設所之議得成？一般咸以為是「臺灣島上為數近二十萬之土著族尚保存極豐富之原始文化，實為研究民族學之難得寶庫」之故。這固是事實，但何翠萍卻指出另一個常人未見的關鍵因素，即凌純聲寬闊的民族學視野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中研院隨國民政府遷台到1955年民族所籌備處成立期間，凌純聲發表的幾篇論文，都跳脫中國格局，將臺灣原住民放置在世界民族誌的脈絡下，進行跨時間、跨地域，兼納古史的文化比較，並以此陳述臺灣原住民何以是民族學之難得寶庫，而民族學和人類學在這方面的專業則是其他學科所不可取代。民族所獨立設所之議，終於在中研院代理院長朱家驊任內拍板定案。

何翠萍撰寫凌純聲一文的挑戰，是如何在資料匱乏的情形下，多方爬梳各類材料。相較之下，劉斐玟撰述的李亦園一文，其挑戰則是如何在不勝枚舉的各色材料中——從學術論著、隨筆、口述史和媒體訪談，到李亦園對其他人類學家的評述，乃至他對自己人類學生涯的自抒但並未公開發表的《大事記》等——找到詮釋脈絡和論述觀點。人類學向來講求「主位視點」，劉斐玟擬建立的人類學史觀，即嘗試以李亦園的「當事人觀點」來觀照李亦園自身的人類學生涯。諸多材料中，尤以李亦園對凌純聲和陳奇祿兩位人類學院士的評述，對於建構「當事人觀點」，別具啟發。蓋評述所映射的既是評述對象之所作為，更是評述者的觀看視點——既是李亦園透過時代的眼睛來觀看他所評述的對象，亦是李亦園對於他所身處之時代的回應與對話，這些評述因之呈現了李亦園的主位視點。這些主位視點輔以《大事記》，共同照見出李亦園的五大學術力——開創力、器識力、領導培力、知識普及力和尊師傳薪。其中的尊師傳薪，對臺灣人類學而言，可謂利弊參半——有不少人對李亦園將「傳薪」窄化為「重用子弟兵」，頗有微詞，甚至感嘆：李亦園如能師承凌純聲寬博的氣度，臺灣人類學界今日或不致飽受「派系」干擾！追撫往昔，無外乎鑒往知來。如何「鑒往」，也是我們這些後輩要學習揣摩的智慧！

凌純聲和李亦園二文，皆以「人物」來照見臺灣人類學的歷史發展，而林文玲則是透過「田野照片」，來顯影臺灣原住民實地調查的過程和成果，特別是民族所在籌備處期間（1955-1965），透過集體田野所拍攝近5000 張的黑白田野照片。照片一般被視為是記錄文化的影像載體；為搶救即將消失的文化

技藝，田野工作人員有時也會委請耆老或技藝傳承人「示範演出」，以供拍攝備存。照片看似只是在田野工作者的操作下，客觀、被動地呈現文化實境，但林文玲卻賦予照片「主體性」，從而揭櫫「照片乃社會傳記」的人類學史觀。「傳記」意味著照片乃是具有生命脈動的存在，而「社會」既是照片呈顯的內容，也是注入照片各式意涵的活水源頭。在「社會傳記」史觀的引導下，田野照片不再只是靜態的文化呈現，而是諸多生命力源源不絕注入其中的「動態表述」——包括：拍攝者的擬思與理論訴求、圖像之文化具象指涉（如：人事時地物）與衍生性指涉（如：情感）、圖像的物質性與媒介性（照片、印刷、數位）、圖像的讀者和使用情境、時間脈流（拍攝當下、後製、分類、典藏、展示）等。是以，田野照片的「社會傳記」不僅見証了臺灣人類學的知識形塑軌跡，更是對人類學之科學性與現實主義，乃至學科願景的反思。

林文玲以「田野照片」回看時代，謝力登則聚焦於1980年代以前來台進行田野的北美人類學家，透過他們的「訪問紀錄」（謝力登、楊孟軒、曾文亮2024）來回看時代；既回看自己當年的研究，也觀照知識生產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政治力和意識形態——而這，正是謝力登所揭櫫的人類學史觀。這些海外人類學家以臺灣作為中國研究的「替代田野」。將「臺灣」和「中國」劃上等號，其背後隱含什麼樣的政治論述、文化想像和學術訴求？謝力登針對這些人類學家口述訪談的比較分析，不僅勾勒出以「臺灣農村」作為「傳統中國」之民族誌知識生產的相關作用力（如：冷戰的地緣政治、區域研究的興起、經費贊助單位的訴求、英美出版界對中國的想像等）；同時，亦藉由這些海外人類學家的「回看」，來呈現他們在其民族誌文本之外的臺灣觀察：當時的政治氛圍（如：對「共匪」一詞的敏感）、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階級、國臺語的語言意識型態、性別關係、學術自由等。這些海外人類學家，雖說原本無意於了解臺灣，但他們對臺灣社會文化的觀察與描述，卻無心插柳的開啟了「臺灣研究（Taiwan Studies）」之前的臺灣研究（Taiwan studies）。

無論有心抑或無意，我們都是時代的產物，但也不應僅止於此。「時代創造英雄，英雄創造時代」，其揭櫫的莫不是英雄在時代的呼喚下，能否應聲而起，成為引領時代的「應時之師」。臺灣人類學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契因，確是時代所促成，但更重要的是，置身其中的一份子，如何回應時代。臺灣人類學界今日能擁有一片沃土，並非偶然，更非理所當然。這一切，都是先行者與無

數無名英雄的戮力耕耘，爾後秋收豐盈。作為後進學子，我們也有我們要回應的時代。所謂「繼往開來」，或許不在抱守前人成規，而在效行前人回應時代的睿智與熱情！

參考書目

李亦園

1962 臺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宗教結構系統 [Two Socio-Religion Structures of Taiwan Aborigines]。刊於[In]亞洲史學會議第二屆會議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2nd Annual Meetings of History in Asia]，頁241-252 [pp.241-252]。台北：亞洲歷史學家編輯委員會 [Taipei: Asian Historians Editorial Committee]。

李亦園、楊國樞 主編

1972 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 [Symposium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陳紹馨

1966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 [Taiwan as a Laborator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2: 9-14。

黃應貴

1984 臺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 [Two Types of Social System among Taiwan Aborigines and Its Implications]。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7: 1-30。

謝力登、楊孟軒、曾文亮 主編

2024 冷戰下的「臺灣研究」：北美人類學家訪問紀錄 [Studying Taiwan Before Taiwan Stud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in Cold War Taiwan]。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Freedman, Maurice

1969 Why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69: 5-13.

Hong, Keelung, and Stephen O. Murray

2005 [1994] Looking through Taiw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Collusion with Ethnic Domination.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Sahlins, Marshall

1963 Poor Man, Rich Man, Big-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 285-303.